

# 西遊，尋？<sup>注1</sup>

文／吳光庭

「傳統與現代」是我成長年代，一個重要且亟需面對的議題，而我也將之視為時代禮物，當成是臺灣當代建築發展研究起承轉合的重要視點之一。

2014年十月，在美東留學（以紐約為主）且剛自學校畢業的一群留學生，透過曾成德教授 助在政府駐紐約辦事處的所在空間辦了一場取名「移植」（Transplants）的建築作品展，也邀請了紐約雪城大學建築學院長 Michael Speaks 及姚仁喜，賴彥吉（Jimenez Lai）等人演講座談。這件「事件」引起了我的注意，至少幾十年來，未曾聽聞政府外館會對一群剛自學院畢業生學習成果的關心，而這群年輕的建築新生代也展現了他們集「群體」之力所策畫的行動是一次創舉，令我備感興奮及期待，也看得出幾代以來的留學生，到現在這一代留學生的膽識是不一樣了。其實，我最期待的是展 主題「移植」的詮釋，這是一個「即入又出」（both in and out）的概念。因為研究上的因素，我對「留學」的活動有興趣，這也與我對「移植」的概念詮釋有關。

手邊有一本書《西學東漸記》，作者是清末洋務運動中的第一位從美國名校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容闈（1928-1912）。他於 1847 年赴美留學，算是位小留學生，1854 年自耶魯大學畢業，他一生受美國教育影響，養成英語文化的思考習慣及處世態度，在 1909 年的生命晚年，他以英文書寫完成其一生的自傳，出版了《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書（中譯本為王藜譯的《西學東漸記》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1 年 4 月出版），書中容闈盡訴其曲折生活，但卻直言其所經歷「留學」教育優點之於未來國家富強的必要，他為使下一代的中國人可以享受與他一樣的教育，他在書中的自序短言中寫道：「一直由西方文明作為例證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在一個東方人內心產生作用，使他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中感到自己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話，豈不是怪事嗎？這



吳光庭  
成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正是我個人的情形，然而我的愛國心和對同胞的熱忱卻未因此衰減，反而更加強烈了…我完全談的是怎樣推行我的教育計劃，這是我對中國的不可磨盡的熱愛的表現，同時也是我認為的使中國走向改革和復興最適宜的辦法。」

容闈一生始終堅信「留學」對國家社會的好處，他為清朝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透過曾國藩請清廷同意幼童留美的政策，中國第一條自築鐵路（京張鐵路）執行工程師詹天佑就是容闈的中國教育改革計劃中的成果之一，而這項源自於十九世紀中國受盡西方全面性的文化衝擊之後所做的歷史反應，其實是自覺運動的一部份，目的不在反應中國如何落後，而在於反應中國曾經反省。但「留學」從清末的洋務運動到今天的社會狀態，尤其在建築的領域中，「留學」的意義又如何呈現？

從容闈的那個時代開始，「留學」就是一扇認識世界的窗，不意外的，有幸參與「留學」活動的人，心中多少牽掛著自己可能貢獻「中國現代」的願景存在，而「西學東漸」也成為幾世代以來逐漸改變中國容貌的重要因素之一，二十世紀初透過對美庚子賠款之還款，延續清末 1909 年清華學堂及民初 1929 年清華學校（留美預備學校）之設置，培育了許多菁英人才，其中不乏學習建築者，如創辦基泰工程司的關頌聲（1913，MIT）、楊廷寶（1921，U. Penn），設計南京中山陵的建築師呂彥直（1911，Cornell）、梁思成（1915，U. Penn）等。從「留學」到「留美」，美國對中國影響力愈形重要，在建築師 / 設計實務上，透過美國

建築師墨菲（Henry K. Murphy）所規劃設計的許多當時以美國基督教會為主體的教會大學，均選擇中國復古式建築形式為校園建築風格，也因墨菲在 1929 年接受當時國民政府委託完成南京《首都計畫》，更使得美國在中國除政治外的社會及文化上有巨大的後續影響及發言，最令人覺得意外的是，這場原以為「西學東漸」的西學至上的巨大社會變革，在建築的領域中，卻是回到了「延續中華文化」的原點，而墨菲在設計復古式中國建築的成就，也成為過程中指導中國建築師及政府官僚如何接受復古式中國建築空間情境及設計實務知識的關鍵人物之一，也因此，國族建築形式的象徵得以確立（恢復），而如何克服傳統的觀念更被視為是邁向現代的積極主張之一。

再以貝聿銘這位旅美的傑出華裔建築師為例，在最近出版的貝聿銘作品全集（Philip Jodidio & Janet Adams Strong 原著，李佳潔、鄭小東譯，《貝聿銘全集》。臺北：積木文化出版社。2012 年 9 月出版）由貝聿銘署名的中文版序言中，貝聿銘說：「我都致力於探索一條中國建築的現代之路。中國建築的根可以是傳統的，而芽應當是新芽，這也是中國建築的希望所在。」

我相信這是貝聿銘潛藏於心中的建築創作宣言，在其同為哈佛同班同學的建築師王大閎的描述中：「當時那一輩學建築的，都很想找出一點中國的東西，貝聿銘也是。」（《建築師》雜誌，民國 68 年 1、2 月合訂本，臺北，頁 74），王大閎更認為他自己「在臺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渴望有一

天能完成幾件深具意義的工作。」（王大閔，〈雄心與野心〉，載於民國 85 年 2 月 28 日中國時報），都反應出當時唸建築的留學生為尋求「中國現代」的真情，他們的付出成為一輩子的使命，即華麗又悲壯，他們在理智上想移植的西方現代，終究抵不過心智上對中國傳統的眷戀。

我認為應該是時空、環境及社會的自然變遷之故，再到我自己的成長年代（1970-1980），「臺灣傳統」成為當時建築學習正課之外很重要的「課外」題材，幾個當時普遍在建築學院內的重要因素，如畫家席德進以水彩寫生描繪臺灣農村及建築風貌的系列作品；漢寶德在東海教學之餘，從事臺灣傳統建築堪察研究及展開中國建築史的學術研究；漢寶德主編的《境與象》雜誌（夏鑄九、郭肇立、張樞、蔡元良等均曾擔任過編輯，後來亦均留學美國），持續對臺灣城鄉環境、居住生活及文化資產保存議題的關心。而李乾朗原為出國留學而準備的作品集《金門民居建築》的出版，影響了當時許多建築系學生想到金門當兵順便研究金門建築的意向。後來，中國時報副刊改版為人間副刊，推動報導文學及攝影，《建築師》雜誌於民國 68 年 1、2 月合訂本出現「以本土替代鄉土」的關鍵字及論述（頁 128），以及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等，這些跡象都使得對社會脈動敏感的建築系學生願意主動去認識課本、設計題目看不到的臺灣，也願意去瞭解不曾見面卻又看似遙遠的「祖國」，也想問在學校唸的中國建築史與古代西洋建築史有何差異？兩者感覺與我們自己都很遙遠不可及，心情很複雜，也很孤獨，但卻

很興奮的看到李乾朗在《金門民居建築》書中分析外來的南洋建築風格如何與閩南建築融合而成，覺得民居建築生活感很強，也沒有一定的規範，比「看不到」的中國建築有趣太多了，而且這些建築都在可以「看得到」的範圍內，稍微平衡了內心的孤獨感。但那份學建築的文化認同意識，依然有些薄弱及空虛，與王大閔及貝聿銘那一輩留學生的「雄心及野心」相比，幾代之間，文化認知的差距已經呈現。

回到容閔認為他在美國所受教育的優越性的問題，而這也正是至今留學活動仍然存在於社會各階層的基本理由之一。容閔的時代不似今日的開放，但相對於容閔之後任何時期已較開放的中國及臺灣社會，教育的開放性仍不及前述任何時期的西方。容閔在其自傳著書中說到，他自耶魯畢業前夕，明顯的感受到「教育（西方）已經明顯的擴展了我的心靈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責任。」（頁 25）我覺得對任何一位曾留學的人士來說，都會理解容閔的意思。

看著目前處於「西遊」狀態的年輕留學生所舉辦的「移植」建築展，我相信建築的存在即反應了真實，但也批判了真實。因此，當我們感受到留學教育為建築學習增添了不是每個人都能完全體驗的成長經驗時，我們的下一步是什麼？

#### 注釋：

1. 本文 2015 年 4 月 16 日完成於台北，首次發表於《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 78 期。